

WOMEN, NATION *and* FEMINISM

 另类视野
文化 / 社会研究译丛

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

陈顺馨 戴锦华 / 选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

Women, Nation and Feminism

陈顺馨 戴锦华 / 选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陈顺馨,戴锦华选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另类视野)

ISBN 7-80109-638-X

I. 妇... II. ①陈... ②戴... III. ①女性主义—研究
②民族主义—研究 IV. ①C913.68 ②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6246 号

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117130、66521152(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E m a i l:edit@cctpbook.com

网 址:<http://www.cctp.com.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51 千字

印 张:11.125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1.80 元

另类视野:文化/社会研究译丛

编委成员

汪 晖 宋伟杰 袁 伟 许兆麟 孙 歌
许宝强 陈顺馨 刘健芝 戴锦华 罗永生

编辑顾问

Giovanni Arrigh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USA

Tani Barlow

Women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SA

Chen Kuan - Hsing

*The Centre for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Muto Ichio

Pacific Asia Resource Centre, Tokyo, Japan

Mushakoji Kinhide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Meiji Gakuin University,
Yokohama, Japan*

Meaghan Morris

Fellow of the 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

Ashis Nandy

*Director,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New Delhi, India*

Suthy Prasartset

Faculty of Economic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Thailand

Sherry Simon

*French Department and Humanities Doctoral Program
Concordia University, Canada*

Tejaswini Niranjan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Bangalore, India

Immanuel Wallerstein

*Fernand Braudel Center and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UNY - Binghamton, USA*

导言一：女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介入

◆ 陈顺馨

大半个世纪以前，英国著名女性主义小说家伍尔芙（Virginia Woolf）曾经在她的作品《三个金币》中说：“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不要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就是整个世界。”^[1]伍尔芙是在一种反战的语境下作这样明确的个人宣言的。她指出，一直以来，妇女被排除在缔造战争的决定过程之外，但当战事爆发，国家却以民族大义之名，号召妇女支持。那么，民族国家对于妇女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伍尔芙对战争的困惑，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普通妇女面对的没有全面获得公民权利（如投票权、土地继承权、参与政治活动等）却要承担与之相关的公民义务（如支持战争、保卫国土、参与救援工作等）的矛盾；伍尔芙对国家的清醒认识，则突出了经由战争而建立或维护的民族或国家利益，与妇女的利益可能是背道而驰的这一事实。或许，伍尔芙以一个女人的身份向国家说“不”这样激进的政治立场，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其背后的理念却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妇女的公民身份为何跟男性不同，以致这大半个世纪在不同国家出现的反战或反民族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的所作所为。

不过，伍尔芙在理念上把“国家”等同与“世界”，却无助于我，不足以让我们深入了解妇女与国族之间那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一些政权为何成功地用民族主义思想统摄妇女解放

运动，特别是在前殖民或半殖民国家。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上，70年代以后，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国际主义精神的崩溃，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扩张，民族冲突和战争此起彼伏；在经济发展上，“跨国”或“全球化”等趋势更是资本主义的幌子，目的之一是要巩固国家的利益。这样，在意识形态的操控和经济利益愈来愈集中在某些“国家”手里的情况下，“世界”实际上与“国家”无异，但这肯定不是伍尔芙愿意成为其中一员的“世界”国。然而，伍尔芙等早期女性主义者所向往的、由一种“女性”文化和价值观所建构的和平“世界”，并没有出现；相反，在反父权或反性别主义这样广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全球女性主义阵营，在受到民族主义的冲击和南北、东西的政治格局分隔后开始分裂。与此同时，由于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女性主义阵营内部也开始质疑是否存在一种统一化的“女性”和本质化的“女性”文化，以及统一的“平等”追求，继而审视不同女性之间的差异，包括民族差异，以及同一民族内不同的阶级、种族、种姓、性别等方面的差异，以便能更具体地分析妇女的处境，制订行动的策略，以期在文化上呈现一个更复杂的“世界”。

女性主义者对民族主义的介入，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第一是理论层面。作为一种思想武器或资源，女性主义批判的是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和不利于女性的性别秩序，以及维护、建构和强化这些关系和秩序的意识形态与践行，如父权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等。民族主义之所以跟父权和资本主义一样成为一种霸权统识（hegemony），是因为在政治上，它的涵盖性把民族/国家凌驾于其他范畴如性别、阶级、宗教等之上；在叙述上，它提供一套整合性的“语法”和“修辞”，把性别、阶级、宗教等统摄其下。一些关注妇女与民族主义问题的学

者，例如印度的瓦哈克思南（R. Radhakrishnan）曾经提出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何民族主义政治凌驾于（如果不是取消）妇女的政治之上？为何大一统（one）的政治曾掩盖‘他者’（other）的政治？为何两者不能在平等和互相负责的对话关系上协调？……为何民族主义能够在意识形态上被认定为一种包罗性和宏观的政治论述，而妇女问题就不能拥有这种特质，反而被框定在具体的和局部的空间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在怎样的自然或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和历史存在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政治成为一种覆盖别的和不同的政治诉求的‘大伞’（overarching umbrella）？”^[2]瓦哈克思南引了著名的民族主义研究者查特济（Partha Chatterjee）的回答：“这是因为非常具体的民族主义政治的意识形态运作成为了政治的常态模式（normative mode of the political），而民族主义所提供的‘想象的共同体’被认为最真实的单位或集体形式。结果，妇女问题（或者是庶民问题）若要被承认为政治问题，就必须用一种限定的民族主义方式加以表达。在这样的压制底下，妇女问题似乎只有两种出路：要么被迫从民族主义运动中脱离开来，要么寻求一种建构‘关系—综合政治（relational-integrative politics）’的另类方式，以免重蹈民族主义的覆辙，成为另一种统摄性的‘大伞’。”^[3]但是，瓦哈克思南并不认同查特济把性别政治局限在对妇女问题的解决上，认为应该进一步从认识论的层面上重新界定“政治”与“性别”这些范畴本身，指出所谓政治提供的“视野（horizon）”，是由性别、阶级、性、族裔等多种相对的力量共同运作所达到的平衡。因此，它必须是一种综合的文化政治的产物，任何一个范畴都不能单独成为一种统摄性的力量。同时，她从女性主义历史书写（feminist historiography）的角度出发，指出“性别”作为一个范畴应

该超越它最初关注的独特对象，以其独特性展示一种普遍性，对其他具“独特—普遍”性的范畴之间的张力进行阅读与阐释。^[4]

第二是行动实践层面。女性主义作为妇女运动的一种策略，在实际行动中提供介入民族主义的可能性。在伍尔芙之后，女性主义者似乎达到一个共识，那就是妇女实际的处境不仅不能脱离民族/国家的语境加以理解，还有妇女根本是民族/国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主义运动应该打通“家”与“国”、“私”与“公”之间的界线，以同盟的身份参与由政治家发动的民族解放运动。但对于另一些女性主义者来说，在认识到妇女实践的处境与民族/国家息息相关之余，对民族主义运动或其他的民族/国家计划仍然保持距离，甚至进行批评。这两种实践模式涉及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主义立场；前者不否定民族主义本身的合理性，只是不满女性被置放在民族/国家计划的边缘上，建构民族主义就是把女性放回民族计划应有的中心位置，至少是与男性平起平坐，并且指出民族主义建构的性别特质，有助于女性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后者否定民族主义的绝对合理性，即不接受以民族/国家作为组织个体和团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以及身份的界定的最终依归或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不赞同其占有的霸权统识位置。不过，无论对民族主义抱有何种立场，女性主义在实践的层面上介入民族/国家计划是值得肯定的，并且有很多历史经验值得参考。正如在一本介绍世界不同地区的女性主义民族主义运动的论文集《女性主义民族主义》的序言中，编者写道：

“这些运动与有关的分析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妇女从一个以妇女为中心的视点，（再）建构了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

的意义，有些女性主义者把这种视点叫做妇女或女性主义‘立足点理论’（standpoint theory）。这个理论所说明的视点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居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像伍尔芙等那样把女性看做国家以外的人和受害人，今天世界上每一个地区的妇女都把自己视为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界定者。毋庸置疑，妇女仍然是个别男人、国家、民族主义冲突以及战争的受害者，而且妇女的利益仍然不断在政治经济和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被边缘化，但她们已经不像伍尔芙那样界定妇女的受害方式，而是加入控制这些发展过程，以自我组织的方式加以反击。”^[5]

第三，女性主义除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介入民族主义外，还在文化再现（cultural representation）的层面上，发挥其批判力量。一直以来，女性主义在文学、电影、艺术、大众文化以及历史书写等文化形式上的批评领域中显得非常有力。在以民族/国家为题材的文化产品中，有关女性的书写、叙述与影像，可以说决不缺少，甚至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文化生产的想象与审美的维度又往往天衣无缝地把女性缝合在民族/国家话语当中，这样，解构这些性别化的民族/国家话语便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不少女性主义者的创作，以丰富的想象力量，突破民族主义对女性生活的界定，再现了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另类关系。女性主义对民族主义文化再现的介入，除了直接在主题、形象、叙述方式、视觉效果以及语言等方面提出批评和进行创作实践外，还针对男性理论家或批评家在对民族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的文化与历史再现进行理论化或评论时所呈现的性别盲点进行批评。最为经典的是女性主义者对印度学者如查特济、古哈（Ranajit Guha）、察克巴替（Dipesh Chakrabarty）等开拓的庶民研究（Subal-

tern Studies) 的介入。庶民研究是一种从批判民族主义或殖民主义精英式的印度历史写作为起点的另类历史书写与论述,目的是将被认为受到压抑的“庶民”(阶级、性别、种族、种姓等意义上的)的声音发掘出来,重新建构印度的历史。但是,女性主义者如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维斯威思华伦(Kamal Visweswaran)等批评这些男性学者无论在理论或实际书写的过程中,都没处理好性别与庶民性(subalternity)的关系或庶民妇女的问题。^[6]在实践方面,他们认为女性主义历史书写要呈现庶民妇女的言说,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言说(small speeches),包括从妇女的传记或手记、非正式的历史档案,法庭记录中女性的证供、监狱记录的口供、斗争记录等等,听取她们的声音,因为这是妇女的历史在场和能动性(agency)的最好说明,并且能够挑战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或精英的民族主义历史书写。不过,妇女真的能发声吗?这个问题仍然困扰着斯皮瓦克等女性主义庶民历史学家。^[7]

前面曾经提到,后现代时期的女性主义对是否存在一种本质化的“女性”提出了质疑,女性主义政治也从强调“平等”向强调“差异”倾斜。强调“差异”,并不意味着取消性/别议题的意义,相反,女性主义的差异政治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那就是提供更大的空间,让不同立场和取向的、对性/别以及相关的议题关注的人,在女性主义这个平台上进行沟通与对话。女性主义政治也不像民族主义那样,试图以一个范畴统摄其他的范畴,或在理解问题与制定行动策略上要求统一或同一,因此,在介入民族主义政治时,女性主义者中间也允许差异的存在,甚至针锋相对,例如前面提到的对民族主义所抱的不同态度。至于庶民妇女能否真正通过他人对她们的历史进行书写而发声,在斯皮瓦克的存疑态度之外,也存在不同的意

见。庶民研究已经脱离印度这个独特的语境，成为了不同地区的女性主义学者的实践领域，由于她们研究的对象的不同，对“声音”、“言说”的理解也迥异，因此自然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研究上海娼妓历史多年的美籍女性主义学者赫雪特（Gail Hershatte）就不同意斯皮瓦克的结论，认为如娼妓这样的庶民中的庶民，也有她们言说的方式：她们以微不足道的言论（例如 30 年代街头妓女被捕时在法庭上所作的自我辩护），说明了她们并不如中国民族主义历史所说的那么被动、可怜（受害者形象），而是主动地（虽然有时是被迫）跟各种试图控制她们的体制（如法律、父权、资本主义等）拉锯，显示了一定的历史能动性。

总的来说，女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介入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全球各民族的女性主义者在这方面的努力，不仅大大的开拓了民族主义批评的视野，同时还丰富了女性主义理论、批评与实践本身的内涵。当女性主义对被民族主义论述简单化的妇女与民族的关系再次提出问题（problematize），并且揭示不同妇女在不同的民族冲突中的处境与能动性，以致在文化再现层面上剖析各种各样的隐喻和创造女性超逾民族/国家规范的叙述空间的时候，民族主义的“语法”或逻辑就会逐渐得以呈现，甚至瓦解，这样，再建构女性与民族各方面的关系才变得可能。我们基本上是根据这样的思路构想这本书的主题与内容，11 篇选定的文章也按照这思路分为三个部分：妇女与民族的关系（第 1—3 篇）；民族冲突中的妇女（第 4—7 篇）；妇女与民族的文化再现（第 8—11 篇）。

妇女与民族的关系

在性别与民族的关系这部分，我们介绍的是两位女性主义学者：伊瓦—戴维斯（Nira Yuval-Davis）和沃尔拜（Sylvia Walby）。伊瓦—戴维斯的新作《性别与民族》（Gender and Nation, 1997）提供了一个相对系统化和完整的分析框架，在理论层面上探讨性别（特别是妇女）与民族的关系，并且指出民族主义计划（nationalist projects）与性别关系有关的三大面向：谱系、文化和公民，以致带出妇女运动以一种横向的政治突破族裔身份的局限与分隔，达到自我赋予权力的效果。本书收录的是该书的第一章《性别和民族的理论》和最后一章《妇女、族裔身份和赋权：走向横向政治》。伊瓦—戴维斯在《性别和民族的理论》一章，首先以一种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立场对性别理论进行梳理，认为“性别”不当被理解为男女之间的一种“真实的”社会差异，而应被理解为一种“话语方式”。其次，她突出妇女属于不同群族这个事实，是构成她们之间的差异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她们在不同群族中的成员身份，必须在支配性结构内加以理解，这个成员身份也与其他社会关系紧密扣连。“民族”涉及的则是国家、公民社会与家庭这些概念，伊瓦—戴维斯认为必须将这些概念区分，才能解构民族主义的内涵。例如民族主义论述把国家视为民族兴衰的指标（因此出现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这样的概念），忽略家庭与社会这些因素在民族观念的建构或民族的想象中所发挥的作用。在对民族、国家、社会等概念进行清理后，伊瓦—戴维斯把民族主义计划所涉及的性别与民族的关系的几个方面，分别进行辨析。

第一方面是妇女与民族的生物性再生产 (biological reproduction)。对于谱系民族主义者来说, 一个民族的盛衰, 最基本的指标就是数量上能否维持平衡, 在这点上, 妇女的生物性再生产 (生育) 很容易被等同为民族的生物性再生产 (繁殖)。因此, 个人的生育选择权 (这对女性主义者来说是基本的妇权) 便很容易被统摄在民族主义计划之下, 例如国民生育的控制很多国家是一项国策, 并出现不同的说法, 指示某个时期妇女应该多生还是少生。另外, 维持民族血统的纯洁性也是谱系民族主义者的关注点, 婚姻与性行为 (特别是妇女) 的控制成为民族的“基因储备”的保证。但正如伊瓦一戴维斯指出的, “那些把谱系和起源作为主要族群的组织原则的民族主义计划, 一般比其他民族主义计划更具排他性……如果在共同的基因储备上加上一个‘种族’建构问题, 对异族通婚的恐惧就成了民族主义话语的核心。”

第二方面是文化再生产和性别关系方面。除了“基因储备”的观念外, 民族主义者想象民族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是“文化与传统”, 那就是通过一套特定的文化编码 (从表面的身体特征、服装风格、行为模式等到深层的习俗、宗教、文学和艺术的生产模式、语言等) 的确认和再生产, 分辨属于一个特定集体的成员和凝聚这个特定集体的力量。这种被称为文化的民族主义计划, 对于其成员不在同一个国家生活而是散居在各地的民族 (如中华民族、阿拉伯民族等) 来说, 比谱系民族主义计划更为重要, 因为更能发挥想象力量, 维系松散的民族共同体。在文化民族主义者所确认和再生产的那套文化编码中, 性别符码起着特殊的作用, 例如在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文化编码中, “大地母亲”、“黄河母亲”等女性化修辞发挥的是一种由母亲所象征的民族包容性、保护性、孕育性, 以及与大自然结

合的无穷力量。本书的另一篇文章《诉说空间：巴勒斯坦妇女与民族叙事的产生》，作者雷雍同样指出民族主义需要一套清晰的修辞，以游说及说服他人接受民族主义的有效性和必要性，甚至接受这是“自然”的。不过，正如伊瓦—戴维斯指出的，男性以民族的名义要求妇女保卫或回归传统，经常跟批判对妇女不利的传统并要求解放的女性主义运动发生矛盾。

第三方面是公民身份的性别差异。在概念上，公民身份与国家息息相关，而这是国家民族主义者最为关注的课题，这样，“国家民族”的建构成为民族主义计划三大范畴之一。此外，国家的政府一般会用行政手段介入公民身份的界定，因此影响也较大。伊瓦—戴维斯没有把对公民身份的理解，局限在正式持有某个国家的护照或在某个国家居住的权利这个层面上，而是采纳马歇尔（T. H. Marshall, 1950, 1975, 1981）的定义，视公民身份为“一个共同体的正式成员资格”，包括公民、政治和社会的权利和责任。但她看到，妇女在这些共同体中的公民身份常常具有多重性质：一方面她们跟男性一样享有某些共同的成员资格，但另一方面，某些国家总有一些专门针对妇女的规则、制度和政策。权利方面，例如女性能够通过婚姻进入男性所属的民族/国家或取得公民身份，反过来，男性则不能这样做，这说明女性的公民身份通常是从属性的。义务或责任方面，例如如何理解女性公民参军也与男性有区别：女性更多属于辅助性的，男性则是保家卫国，因此女兵与男兵在工作分配上一般是不同的。另外，由于公民身份更多的是由所谓“公共领域”的事务所界定，而女性被认为更多是属于“私人领域”的，这一定程度影响了女性公民身份的认受性。

作为女性主义者，伊瓦—戴维斯最关心的，其实是女性在社会（特别是民族）层面被不断加以区分的情况下，如何能够

团结在一起？因此，她在《妇女、族裔身份和赋权：走向横向政治》一章中，提出一个突破身份政治的局限的行动策略：“横向政治”。这个来自意大利妇女运动的策略，涉及两个关键概念：“扎根”和“移动”。“扎根”的意思是妇女拥有自己的集体和身份，在与属于别的集体和拥有别的身份的妇女进行对话的时候，她们既有的观念会在对话中传达开去。与此同时，为了对话能够进行，她们就得努力使自己“移动”，即不能死死地守着自己的位置，伊瓦—戴维斯补充说，“移动”的过程不应该涉及解除自己的中心，不然会失去自己的根和价值观；也不应该同化“他者”，更必须承认，拥有类似“根”的人的位置与观点，必然存在差异。换句话说，“横向政治”是一种以对话取代统一化和同质化的过程，而对话之所以成为可能，是承认参与对话的人有其具体的定位，也承认每个具体的位置只能产生一种“未完成的知识”。这样，对话的参与者才感到有力量，或者获得某种正面的权力。这种理论对于打破民族主义的霸权统治是具有启发性的。

跟伊瓦—戴维斯一样，“女人与民族”的作者沃尔拜较早关注到性别在民族主义论述中的重要性。她是在回应伊瓦—戴维斯和安斯亚斯（Floya Anthias）、加亚瓦尔丹拿（Kumari Jayawardena）、安罗（Cynthia Enloe）等人在不同层面上关注性别与民族、国家以及国际秩序的关系的观点后，提出差异概念在这个议题中的重要性。例如沃尔拜在批评伊瓦—戴维斯与安斯亚斯的理论之余，进一步追问：妇女是否像男人一样支持民族/族裔/“种族”计划？她们的计划与男人的计划是相同的吗？妇女的民族主义/族裔/“种族”及其他大规模的社会计划，其边界与男人的是否相同，还是更全球化，或者更地方化？她的答案当然是：不一样或不同。例如她举例说，妇女不

太支持军国主义，却对国际和平及合作表现出更多的热情，这从多方面影响着性别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她也认为妇女的政治行动一般比男人更本土化，更少民族主义。最后，她的结论是，一个民族或族裔计划，必须经历不同的阶级和性别的社会力量的斗争，因此，民族之间的关系，部分是由本土特定的性别化斗争所形成的。或许我们可以从一些具体的民族冲突妇女的斗争，验证沃尔拜所作的结论。

民族冲突中的妇女

20 世纪的人类政治史上，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战争可以说此起彼伏，触目惊心。民族主义的抬头，不仅挑战不同地方（特别是所谓第三世界）的殖民统治，还挑起历史中没有解决的民族仇恨或争执，使得在某种政治环境下和平共存的民族，开始互相侵犯，而这些民族之间的冲突很多时候又与宗教纠缠在一起和国家政权的建立有关，形成多种力量的拉锯战。在这些民族冲突中，从谱系、文化到公民身份，作为一种主导的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的不同面向，全面开动，使冲突变得更为激烈和复杂化。正如上一节提到的女性主义理论所指出的，妇女必然被卷入这些冲突之中，进而又引发女性主义者在行动上的介入。第二部分所选的四篇文章，涉及三个地区不同时期的民族冲突，包括独立运动时期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分治上的冲突、南斯拉夫联邦分裂后的民族战争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这些冲突至今仍然以某种形式持续着。

独立前的印度在脱离英国殖民统治时，曾经在分治的问题上与巴基斯坦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个冲突出现在半个世纪多前的 1947 年。一般历史记载的是分治的结果：两个独立国家

宣布成立：回教徒西迁到新设立的巴基斯坦国，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则东迁到印度。正如《沉默的问题：分治、妇女与国家》的作者布塔丽娅（Urvashi Butalia）说的，“令人惊讶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新政府根本就对这种动荡局面始料未及——他们没有想到，根据不同宗教信仰划地而治（那么多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对那么多的回教徒）引起的不安与恐慌，会迫使人们背井离乡到他们认为更安全的同一宗教社群中去。”在这次充满不安与恐慌的大迁徙中，妇女成为主要的性暴力受害者：估计有 7500 万妇女被异教的男人强奸和拐卖。但布塔丽娅发现，这些妇女的遭遇，并无人问津，有关分治的文献只记载政府间的争论、领导之间的协议与分歧、党派之间的矛盾等与“政治”因素有关的内容。当她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记录妇女当时遭遇到的情况时，却深深的感受到“分治是一个深刻的与性别问题有关的问题”，因此，要理解这段重要的历史时期，必须以性别作为基本的分析范畴，即分析妇女与这些事件有什么关系，她们如何处理这些事件，以及她们的经历如何被再现出来。根据布塔丽娅听到的骇人故事，印度妇女除了在大迁徙的过程中遭到男性异教徒的性暴力对待外，还在迁徙之前遭到同一宗教的男性的杀害。原来村落间的宗族暴力在分治前几个月已经开始，不同教派的男人一方面攻击另一些教派的人，另一方面设法保护自己教派的女人。他们认为，女人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一旦落入别的宗派的男人手中，要么被迫改变宗教信仰，要么被强奸，怀上异教徒的孩子，这样女人不仅失去了贞洁，整个社群和种族的纯洁性也会因而受到玷污。因此，当他们没有能力拯救女人时，不少男人便把家族的女人杀死，并说她们是“殉教”。不少妇女也“自愿”地集体投井自杀，以保持自身与宗教的清白。但是根据布塔丽娅的调查，这些殉教